粵方言詞典對比研究
——以近三十年來粵方言詞典所收核心詞為例 *

羅鈺然[1]　吳文治[2]
1.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
2. 暨南大學中文系
luoyuran0711@outlook.com

提　要　方言詞典是特殊的語文詞典，方言詞典編纂是方言學研究重要的任務之一，而方言學界對詞典編纂理論的關注尚少。本文基於詞典學理論，以共有的基本詞彙爲綫索，對既已出版的粵方言詞典進行抽樣研究，嘗試從宏觀結構和微觀結構兩大方面對粵方言詞典的特徵進行分析與總結，歸納出它們的共性與特點。通過對 6 本詞典的對比分析，本文認爲粵方言詞典在收詞、立目與釋義上的平衡性與系統性仍需提高，並針對方言詞典編纂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　粵方言；方言詞典；詞典編纂；對比研究

壹　引言

近年來，隨著粵方言詞典出版成果不斷湧現，針對粵方言詞典編纂的相關研究也愈來愈受關注。這些研究主要可分爲兩部分：一是不同時間對粵方言詞典出版情況的階段性整理，包括詞典出版成果的統計和詞典的分類，黃奇芳（2000），詹伯慧、肖自輝（2016），陳晟（2021）等都有討論；二是針對粵方言詞典編纂特定問題的討論，這類討論包括粵方言詞典的編纂原則、體例等，同時也包括針對具體問題，如收詞、立目、用字（還包括印刷字體等）、註音、釋義（包括詞類標註、釋義方式、條目排列、配例、釋義準確性等）、索引設計等，詹伯慧（2016），高然（2013、2023）等均有所討論。上述的思考與討論豐富了粵方言

* 本文受“廣東省教育廳高校青年優秀科研人才國際培養計劃”及“暨南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人文社科）”資金資助。

詞典理論建設。爲了進一步完善粵方言詞典編纂的理論體系，構建更加科學、系統的粵方言詞典編纂方法，我們還需要開展更多深入細緻的案例分析。爲此，我們將以如下的標準對研究範圍進行劃定：一，詞典的描寫對象爲以廣州、香港爲代表點的粵海片方言；二，詞條的結構必須包含“詞目”“發音信息”“釋義信息”三個部分；三，詞條的釋義語言爲漢語；四，詞典出版時間處在 1995 年至 2024 年。據此，我們選定了 6 本具代表性的詞典，以出版時間爲序排列如下（爲行文流暢與避免混淆，本文將以編者姓名代稱詞典名稱，如《鄭本》等）：

《香港粵語詞典》鄭定歐。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7。

《廣州方言詞典》白宛如。 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廣州話普通話詞典》劉叐盛。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麥耘，譚步雲。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

《廣州話方言詞典》饒秉才，歐陽覺亞， 周無忌。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0。

《現代粵語詞典（廣州音 第一版）》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詞典編纂組，范俊軍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

同時，本文以斯瓦迪許編製的 207 核心詞列表（M. Swadesh，1952）爲依據，橫向考察上述詞典的處理。核心詞反映的是核心概念，是共有的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概念。本文選取核心詞爲研究對象，目的是儘量避免各詞典收詞立目的不平衡性，集中分析上述 6 本詞典在處理方面的共性與差異以及各自的優劣之處。

Hartmann（2001）將詞典的結構劃分爲三個部分，分別是宏觀結構（macrostructure）、微觀結構（microstructure）和框架結構（megastructure）。宏觀結構，主要涉及詞典的收詞、立目等方面，通常指的是詞條的左項；微觀結構，主要涉及對詞目詞的釋義，通常指的是詞條的右項；框架結構，是外置信息部分與宏觀結構的合稱，外置信息通常包括前、中、後置頁。研究者對宏觀結構、微觀結構的區分鮮有異議，通常差異在於所用術語及指稱範圍大小不同，但對“宏觀結構”“微觀結構”的觀點基本相同（見黃建華 2001，章宜華等 2007）。本文將根據語義全面篩查 6 本粵方言詞典中的對應詞條，著重從宏觀結構、微觀結構兩大方面進行對比研究。

一、宏觀結構比較

宏觀結構，包括詞典的收詞與立目，前者涉及收詞的範圍、原則等，後者涉及詞目的分合、主次等問題。一般認爲，詞典的收詞原則包括價值原則、科學性原則、規範或描寫原則等（胡明揚等，1982）。下面將從收詞和立目兩方面對 6

本詞典的核心詞情況進行分析。

先談規範或描寫原則。不同於《現代漢語詞典》這一類以規範性爲主的詞典，《現代漢語詞典》是我國第一部漢語規範型詞典，因此其規範性特點突出；而上述 6 本粵方言詞典則以描寫性爲主，主要對粵方言進行較詳細、全面的描寫。但需要强調的是，6 本詞典雖以描寫性爲主，但描寫性與規範性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多與少的選擇。二者之間還涉及詞典定位、風格以及編者等方面的因素。從宏觀結構角度來看，6 本詞典描寫性特點突出，在價值原則、科學性原則方面有所體現，下面將逐一進行分析。

價值原則方面。通常認爲，宏觀結構中，與價值原則緊密相關的問題是所收錄詞目的使用頻率。由於核心詞的基礎性與常用性，在數量上，6 本粵方言詞典對 207 核心詞的收錄情況大致相同，即 6 本詞典收錄核心詞的數量與 207 核心詞總體而言相當。但儘管作爲語言中普適性較强、普遍性較廣的核心詞，在詞典收錄中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以核心詞中的稱謂詞爲例，“老公”與“老婆”是一組對應的稱謂詞，根據我們的考察，目前僅有《饒本》收錄了兩者；《劉本》《范本》以及《麥本》僅收錄了“老公”，而未收錄“老婆”；《白本》僅收錄“老婆”；《鄭本》則兩者皆未收錄（詳見表 1，下同）。從使用頻率的角度來看，這一對稱謂詞通用性强、且具有較廣的使用範圍，若出現漏收則應考慮是否出現偶然性的漏收還是系統性的偏差。

表 1 各本詞典“丈夫”“妻子”“小孩”義的收錄情況

詞目	《劉本》	《范本》	《饒本》	《鄭本》	《麥本》	《白本》
老公	+	+	+	-	+	-
老婆	-	-	+	-	-	+
老公仔	-（釋義中出現）	-	-	-	-	-
老婆仔	+	-	+	-	-	-
細佬哥	+	+	+	-	-	+
細路仔	+	+	+	+	+	-
細路女	+	+	+	-	-	-
細蚊仔	+	+	+	+	+	-
細個仔	-	+	+	-	-	-

科學性原則方面。收詞原則中的科學性原則，指的是所收詞目的準確性和系統性。從 6 本詞典核心詞的比較來看，突出問題在於其收詞的系統性方面。我們仍以稱謂詞爲例，粵方言的表達中，“老婆仔”“老公仔”表示親昵，然而是否作爲分立詞條則有待商榷（見表 1，下同）。若通用性較强的詞目變體，需基於系統性原則考慮是否分立詞條。所謂系統性原則，指的是同一本詞典對相應詞條的處理方法是否一以貫之。從 6 本詞典的處理情況來看，它們的處理方式各有不同。《范本》《鄭本》《麥本》與《白本》均未收錄上述兩種親昵表達；《劉本》和《饒本》則將“老婆仔”分立條目，而未將“老公仔”分立條目。較爲特殊的是，《劉本》中，“老公仔”未分立條目，但在釋義中以“ 老公仔（童養媳的小丈夫）”的形式出現，而“老婆仔”則分立條目。但是，《劉本》未收錄“老婆”，稱謂詞的內部語義關係未能得以體現，容易使用戶查檢時産生困惑之意。基於詞典收詞的系統性與平衡性原則，粵方言詞典中此對關聯稱謂詞理應全部收錄，如“老婆”“老公”則理應都收錄，“老婆仔”“老公仔”則不單獨分立條目，可在釋義以多種形式呈現，從而加强詞典收詞的系統性。側面來看，稱謂詞的漏收是方言詞典編纂需多加留意的方面，方言詞典除了收錄地道特色的說法之餘，還需提高其系統性與平衡性，以便用戶進行查檢。

從立目的層面來看，詞典立目指的是確立相關聯的詞語是否成爲詞目，並確定其分合、主次等情況（胡明揚，1982）。從核心詞的比較來看，粵方言詞典的立目標準是較爲混亂的。粵方言中，與“小孩”相關的表達有“細佬哥”“細路仔”“細路女”“細蚊仔”“細個仔”幾種（詳見表 1）。幾本詞典對此的處理大致分爲兩類，一種是幾種表達均收錄，如《范本》和《饒本》，而《劉本》未收錄“細個仔”；另一種只收錄“細路仔”“細蚊仔”，如《鄭本》與《麥本》。從處理的情況進行分析，我們認爲兩種處理情況皆可優化。

實際上，上述提及的“細佬哥”“細路仔”“細路女”“細蚊仔”“細個仔”是“細路”的變體形式，“細佬哥”“細路仔”“細蚊仔”“細個仔”均表示“小孩”，其中“細佬哥”“細蚊仔”“細個仔”是詞彙化後形成的詞彙單位，可單獨立目。“細路仔”“細路女”則可再細分，“細路仔”可分立兩個義項，一表“小孩”，義同“細佬哥”“細蚊仔”；二表“小男孩”，與“細路女”相對。若都將其進行立目或未形成詞目間的參照，會使詞條信息冗餘，同時也會讓用戶查檢時産生割裂感。因此，基於詞典編纂的經濟性原則以及語言內部的語義關係，我們認爲可將“細路女”分立條目，指“小女孩”，“細路仔”則可根據詞典定位

進行歸類，可將“細路仔”分立條目，設有兩個義項；也可以“細路”作爲主詞條，“細路仔”“細路女”作爲內詞條呈現。

貳　微觀結構比較

一般來說，詞條由“形式描寫”與“語義詮釋”兩個部分組成，“形式描寫”包括拼寫、語音等信息，“語義詮釋”則包括釋義、用法、註釋等內容（章宜華、雍和明，2007）。詳見表 2。

表 2　粵方言詞典詞條結構對比表

詞典	形式描寫			語義詮釋		
	詞形	讀音	筆劃數	釋義	例證	附加信息
鄭定歐《香港粵語詞典》	＋	＋	－	＋	＋	＋
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	＋	＋	－	＋	＋	＋
劉叛盛《廣州話普通話詞典》	＋	＋	－	＋	＋	－
麥耘等《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	＋	＋	－	＋	＋	＋
饒秉才等《廣州話方言詞典》	＋	＋	－	＋	＋	－
范俊軍等《現代粵語詞典》	＋	＋	＋	＋	＋	－

通過對比，我們發現 6 本方言詞典的詞條結構大致相同（如表 2 所示），均包含“形式描寫”與“語義詮釋”兩大部分。存在差異的是“形式描寫”中的“筆劃數”與“語義詮釋”中的“附加信息”。而其餘部分雖然均有出現，但各部分的具體內容有所差別，下面將分項闡釋。

（一）“形式描寫”的對比

“形式描寫”中，“讀音”與“詞形”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下面集中討論這 6 本詞典對這兩個部分的處理。

1. 讀音

我們認爲，粵方言詞典的讀音信息應當描寫粵方言當前實際的語音樣貌。高然（2023）已對《麥本》《饒本》《鄭本》以及《香港粵語大詞典》（張勵妍等，2018）進行了仔細對比。下面從註音對象和註音方法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註音對象，指註音的項目及內容，可分三個方面來討論。（1）聲母。6 本詞典將聲母分成 20 類或 23 類，這相異的 3 個聲母與兩組互補的聲母音位相關，即

只與以 [i][y] 開頭的韻母相拼舌葉音組 [tʃ][tʃʰ][ʃ] 和不與上述韻母相拼的舌尖音組 [ts][tsʰ][s]。（2）韻母。最主要的差異在於詞典是否收錄 [ɛu][ɛm][ɛp]，如 [tɛu²²]（“丟弃”），[lɛm¹³]（“舔”）、[kɛp³]（“夾”）等，但這類情況的例子不多，除此之外，韻母部分各本的差異不大。關於聲母和韻母的部分我們發現，總體上音節的數目沒有大的差異，但由於聲母的不同，音節在索引當中處於不同的位置。（3）聲調。各本對聲調的描寫主要有兩個分歧：一是陰平調的高平調 [55] 和高降調 [53] 是否合幷；二是相同調值水平的聲調是否合併爲同一個調類。

註音方法一般有兩種：以拉丁字母註音或以漢字註音。一，採用拉丁字母，有直接採用國際音標的，也有先定義拼音方案後再在詞條中進行標註的。各本所使用的拼音方案不盡相同，包括“廣州話拼音方案（1960）”“暨大方言研究中心粵語拼音方案（2009）”等，其中《劉本》採用“廣州話拼音方案（1960）”和國際音標兩種標記法。各拼音方案在其系統內部均有足够的自洽度，除該 6 本詞典所涉及的幾種拼音方案外，其他 30 餘種粵方言拼音方案也存在更爲詳細的比較（陳永聰、侯興泉，2023），本文限於篇幅不作詳細討論。二，傳統的漢語註音方法，指用直音法、反切法等方法進行註音，但必須强調的是，這類註音方法以粵方言發音作爲討論對象，而不是對韻書的引證。例如，《麥本》有“黐，音痴，妻衣切。”其中粵方言中“痴”與“黐”同音，即採用了直音法；“妻衣切”則採用了反切法，取了粵語“妻”的聲母 [tsʰ]、“衣”的韻母 [i] 及聲調“陰平”。“黐”的反切上字“妻”的聲母或反切下字“衣”的韻母、聲調均是以當前的粵語音系爲基準，並非以它們在中古切韻音系中的語音地位爲基準。這種註音方法可行的基礎，是詞典使用者能够認讀被用於註音的反切用字，但是凡例中並未對反切法的依據作進一步說明，也未對反切用字進行界定。另外，經查閱，僅《鄭本》對一些相對生僻、用法有爭議或“有音無字”的情況的字作了歷時語音信息的相關介紹，主要以引用韻書原文的形式呈現。其中可能不僅包含語音信息，還包含詞源的參考信息，均放在釋義後面。例如，“黐……|| 廣韻支韻醜知切：‘所以粘鳥。’集韻：‘博雅黏也。’”（《香港粵語詞典》）。

經過對比分析，我們認爲準確註音宜用國際音標。使用傳統音系學註音的方法亦是有效的手段，但建議其作爲輔助性的註音方式出現。總體來看，6 本詞典對粵方言粵海片的語音描寫差異不大。儘管在內部的音系有差異，但從音節層面來說，微觀結構上聲母、韻母的差異可以從中觀結構得到互補，這說明粵方言詞典編纂者們對粵海片的音系有相當高的共識。但從詞典用戶的角度來看，各本詞

典註音方法與呈現方式的標準不一，容易提高用戶查閱或對照學習的難度。我們認爲詞典應該在凡例中進行較詳細準確的說明，特別是本詞典中所使用的拼音方案與國際音標的對照關係。另一方面，我們也呼籲對拼音方案規範化提高重視，注重對現有不同拼音方案合理性的協調。

2. 詞形

“形式描寫”中的“詞形”一般指詞條的書寫形式。粵方言以聽、說爲主要傳播媒介，其讀、寫場合相對有限。總體而言，粵方言的書寫形式仍然是以漢字爲主，包括少量的外文符號。由於規範化的缺失，粵方言用字與普通話詞典有很大的差異。

首先是關於“繁、簡、異”用字的問題。這不僅與使用的區域有關，還可能跟詞典的義項分立有關。《饒本》有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話詞典（第 2 版）》，2019）和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廣州話方言詞典》，2009）的兩個版本，但內部差異不大。《鄭本》全部使用繁體字，個別字使用簡化字，並將部分簡化字當作借用同音字以區別義項，如“曬（日曬）—晒（食晒）”“邊（旁邊）—边（边個）”“點（一點）—点（点樣）”等；使用特殊字，其來源均使用雙竪綫“||”以說明。

除此之外，這 6 本詞典的用字主要還有如下幾種標準：

（1）本字。參考的來源是傳統字書，如《廣韻》《集韻》《玉篇》等。本字的確定通常需要嚴格的考證過程，各本之間存在不少差異，可見各本尚缺乏一定共識。

（2）文本的實際使用情況。例如，《鄭本》以八九十年代香港報刊中常用的形體爲依據，個別參考其他漢語方言的習慣寫法；《麥本》“取社會上慣常使用的寫法，不一定追求本字、正字，但必要時會用括號註出另一種寫法或本字”，則是一種比較包容的做法。另外，由於歷史與地理因素，外來詞也經歷了一定程度上本地化。

（3）“有音無字”的情況，標註的手段有四種：一，借用同音字，在詞典當中通常是附加符號來進行說明並非本字；二，使用訓讀字，例如“孖”“罅”等；三，使用民間自造字，這種字在計算機顯示方面有一定的困難，只能通過偏旁部首的圖形拼湊而成；四，使用方框符號（即“□”）來替代，其中《劉本》在索引處舉出了該本出現的所有的“有音無字”詞條，便於查找。外語音譯詞一般寫同音或音近字，無同音或音近字可寫的就直接寫外語原詞，如“阿 SIR”，實際

讀音隨後註出。

值得注意的是，6 本詞典以漢字作爲詞頭，而不是以語音信息作爲詞頭。《范本》在此基礎上更提供了對“漢字筆劃數”的檢索系統。

綜上所述，學界對粵方言粵海片語音信息的描寫有比較高的共識，但書寫形式方面尚存在很大的分歧。規範性和描寫性的特點通常都會在詞典當中有所體現，粵方言詞典用字的不統一，容易給用戶造成誤解。我們認爲，描寫性原則方面，儘管粵方言的書寫形式相對少見，但它畢竟是相對真實的書寫語料來源，是文本介質的粵方言詞典編纂的不可忽視的參考；規範性原則方面，則需要儘量參考漢語方言學界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並結合實際應用情況，對粵方言的建議用字進行整理和歸納，爲用戶提供參考。同時，詞典應一以貫之，清晰引導用戶，以便用戶進行查閱。另外，語音或語義作爲詞條的檢索方式值得肯定，而字形作爲檢索方式的一部分做法仍值得商榷。

（二）“語義詮釋”的對比

從表 2 可以看到，6 本詞典釋義中的“語義詮釋”部分，都包含釋義與配例兩個部分。需要注意的是，並不是每本詞典都包含附加信息。從我們的對比來看，目前《鄭本》《白本》《麥本》出現附加信息，其中包括本字考訂、特殊字音說明、文白異讀、詞源信息等。由於所對比的核心詞詞條中附加信息內容較少，且附加信息的內容 6 本詞典各不相同，本文暫不討論附加信息的內容，我們將詳細分析釋義與配例的具體內容。

1. 釋義內容

詞條釋義是詞典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學界關注的重點。這裡，我們以極性反義詞作爲代表進行分析。

極性反義詞在語義上具有連續性與模糊性的特點，一對極性反義詞的兩極在使用上並非呈現“非此即彼”的邏輯條件。極性反義詞在語義上可依據不同的搭配、語境等呈現出不對稱分布。在方言中，方言義位也存在極化現象，方言的義位極化可表現爲正極義位派生出負極義（趙紅梅，2011）。粵方言中，這種情況在語音上也有所區別。以“大”爲例，粵方言中“大”有三個讀音，分別是 [tai^{22}] [tai^{35}][tai^{55}]。[tai^{22}] 與普通話中對“大”的釋義對應，即“與‘小’相對”，[tai^{35}] [tai^{55}] 均爲 [tai^{22}] 的變調。對於這種變調情況，6 本詞典有不同的處理，分別如下（均改用簡化字，下同）：

（1）【大】三畫 （一）daai^{1} 不够大，顯得小：咁～個就識 人 [這麼小就會

哄人] 啲咁～ [一丁點兒大]。（二）daai^{3} 退而求其次的大小程度：就係咁～喇，唔要就算 [就是這麼大的了，不要就算了]。（三）daai^{6} ①在提及、面積……（范俊軍等《現代粵語詞典》）

（2）【大】tai^{-1} < 讀第 1 聲 > 小：我睇過喇，好～嘥。（我看過了，很小的。）[這是“大”的變調]（麥耘《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

（3）【大】dai$^{6-1}$（帶 1）“大”的變音，“小”的意思：咁～，我唔要〔這麼小，我不要〕 咁～～嗰就想開車啦〔這麼小小的就想開汽車了〕？ 啲咁～嗰〔小不點兒〕。（饒秉才等《廣州話方言詞典》）

（4）【大】tai1 表示小：咁～$_{才這麼大點兒}$｜咁～～$_{就這麼小}$｜啲咁～～$_{丁點兒大}$。（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

（5）【大】dai^{1} 粵口語變音。表示與字義相反的意思◆咁大大個就識騎摩托（年紀這麼小就懂駕駛摩托車）。（劉扳盛《廣州話普通話詞典》）

可以看到，針對這種變調情況，幾本詞典分立條目；但對比釋義的處理來看，可分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直接釋義，不標註變音情況；第二種是標明變音情況。後一種情況的處理各有不同，如《饒本》和《劉本》均在語音信息後標註其爲變音，而《麥本》則在“附加信息”當中標明。而《范本》的處理較爲特殊，雖然未在釋義中標明變音情況，但其詞目的設立是以字形作爲索引，同形異音的詞條分別以“（一）（二）……”放置在同一詞形下。

上述提及的極性反義詞的變調情況，涉及語義上的聯係。因此，各本詞典在處理相關釋義時有不同的做法，或在釋義正文開始前進行說明，如《饒本》；或放置附加信息中，如《麥本》；或不註明變調情況，如《鄭本》和《范本》。在釋義正文前進行說明與放置於附加信息中，達成的效果相似，都能形成詞條間的互相參照，建造出內部的交叉檢索路徑。不註明變調情況，還可分兩種情況討論。一種是直接不註明，如《白本》；另一種是放置在同一字頭下，如《范本》。這種處理涉及詞典的參見系統。參見系統是詞典內部系統關聯性的有效體現，通常反映詞條之間的語音、語義、語用等信息。詞條間的關聯越緊密，詞典的系統性越强。前者，不註明語音上的變調，若因檢索系統的設置不同，詞條間的連貫性與關聯性將會受到影響，容易導致用戶在檢索、理解時産生割裂感；後者，放置於同一字頭下的做法，是與該詞典的檢索結構相關。《范本》在凡例中說明“普通話不是多音字而粵語是多音字的，不分立字頭，以（一）（二）列出粵語的不同讀音”。換言之，這種處理是以普通話爲標準進行收詞立目，但實則是對普通

話所對應的粵語詞進行釋義。這樣的做法雖然對粵語學習者而言有一定的便捷性，但容易造成釋義元語言轉換不對等的問題。其次，以“形爲主，音爲輔”的檢索系統，在粵方言詞典中還需考慮字形或詞形規範的問題。在上面的分析也提到，幾本粵方言詞典的詞形問題是比較混亂的，並沒有形成規範的、通行的標準，理解性、操作性問題上會造成一定的困難。因此，我們認爲多音字不分立字頭的情況，不僅要考慮詞目本身的關聯，還需綜合考慮詞典框架結構的總體設計。

2. 配例選擇

詞典的配例與釋義是詞典的重要組成部分，例證與釋義各顯其職，相互補充，反映詞目詞各方面的語言信息。《當代詞典學》（章宜華、雍和明，2007）將配例的功能分爲語義功能、語法功能、語體功能、語用功能以及翻譯參考功能。對方言詞典而言，除了考慮詞目詞各方面的功能，配例是否採用方言特有表達、是否承載方言文化等更是方言詞典編纂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我們對比了 6 本粵方言詞典中核心詞的配例，配例的內容不盡相同，各家有各家的表達，但集體反映出幾方面的特點：

一，配例重複反映詞目詞的語法功能。配例可以說是釋義的延伸，一定程度上是詞目詞的動態體現。但配例的數量越多並不代表配例能够完整、恰當地反映詞目詞的語言信息。反而形成冗餘。而粵方言詞典的配例，或多或少出現重複的現象。最爲明顯的是配例重複反映詞目詞的語法功能。如“食”：

（6）【食】吃；喝；吸：～嘢 [吃東西] ｜～晏 [吃午飯] ｜～飯｜～粥｜～糖水｜～肉｜～魚｜～烟｜～奶｜～藥｜好好～……（范俊軍等《現代粵語詞典》）

（7）【食】①吃：～飯｜～藥｜～得〔能吃〕。②喝（粥）：～粥。③抽（烟）：～烟……（饒秉才等《廣州話方言詞典》）

（8）【食】sek6 吃：～飯｜～嘢（吃東西）。（麥耘等《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

（9）【食】sek6 抽（烟）：～烟對身體冇好處。（抽烟對身體沒有好處。）（同上）

（10）【食】sek6 ①吃：～飯｜～飽｜～厭｜～藥……（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

配例中，“食飯”“食粥”“食糖水”“食肉”“食魚”“食奶”“食藥”都遵循“動詞 + 賓語”的語法結構，且配例在方言中不具備特殊性，帶有重複意味。“好好食”表達的是狀中結構，與“動詞 + 賓語”的語法結構形成互補，則

可保留以達配例多樣化。另外，“食晏”屬粵方言中較爲特別的表達，也應當保留，以顯方言詞典的特性。

二，例證的表達形式傾向不明。詞典的配例，表現形式除了語詞例證，還有句子例證。句子例證，在幾本粵方言詞典中有幾種方式：第一種是普粵的通用形式，後面不加對譯；第二種是粵方言的表達形式，後面通常帶有普通話譯文；第三種是粵方言表達形式，但不添加對應譯文。三種情況在 6 本詞典均有出現，但各自有不同的傾向。第三種粵方言表達形式的情況較少，通常出現的是第一種與第二種情況，如《范本》和《劉本》兼具前兩種形式。而《饒本》和《麥本》雖兼有兩種形式，但句子例證以粵方言表達爲主。《鄭本》則以第三種方式爲主，但對一些特有的、難理解的例證也標註普通話譯文。選擇粵語特有表達還是普通話粵語通用的例句，應是編纂者依據詞典的定位綜合考慮的問題。若詞典屬粵語單語詞典，例證中需提高粵語特有表達的比例，而普通話粵語對應詞典則應平衡例證中普粵通用以及粵語特有表達的比例。

叁　關於方言詞典編纂的幾點思考

（一）方言詞典的定位

對方言詞典的清晰定位是方言詞典編纂工作的大前提。由於漢語方言的特殊性，方言詞典與通用型語文詞典存在一定差異（曹志耘，2023），是一種特殊的語文詞典（陳晟，2021），它既具普通語文詞典的一般特徵，又具有方言詞典的特性，如百科性、文化性等。雖然這一論題已是老生常談，但許多因素仍需細酌。

首先，是方言詞典編纂的選擇傾向性的問題。方言詞典具備“田野調查、語料總匯、地方百科和學術研究”四個特點（黃樹先、吳娟，2019），但在方言詞典編纂的實際操作當中不太可能面面俱到，常常要分主次，逐步完善。因此，方言詞典編纂的選擇傾向性是不可回避而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

其次，隨著城鎮化的不斷發展，方言的特色正承受不同層面的磨損。如今已有不少方言保護的搶救活動正在進行，如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等。這類項目收集了許多方言材料，而這些材料如何在方言詞典中有所體現，是我們需要有效結合幷落到實處的重點。

（二）方言詞典編纂需遵循平衡性和系統性

基於上述的對比分析，我們認爲，方言詞典編纂應該同樣遵循平衡性和系統性的原則。

一、收詞立目方面，粵方言詞典需注重收詞立目的平衡性。僅僅記錄“方言特徵詞”是不够的，一是對“特徵”有先入爲主的認識，二是容易造成方言表達的失真。就粵方言詞典而言，形式上粵方言與普通話不同的部分，或所謂“粵方言特徵詞”的部分，不意味著詞形上有差異則可盡數立目，必須考慮詞義之間的語義關係；形式上粵方言與普通話相同的部分，則不能主觀上認爲他們相同，它們往往具有隱性的差異，後者同時也包括粵方言內部的“文白異讀”層次等，不能簡單化處理。因此，必須將方言視作一個語言學意義的整體，在方言的語境下討論方言的收詞，而不是將普通話與方言的內容完全對立或完全雜糅於一起來討論。

二、釋義方面，粵方言詞典中釋義內容的系統性仍需提高。方言詞典雖作爲一種較特殊的語文詞典，其釋義與一般語文詞典的釋義原則與特點仍有較高的契合度。釋義內容系統性的提高可表現爲幾種形式：一，注重釋義的內部參見，建構詞條內部、詞條外部的參見，使得詞典中的詞目形成緊密的語義網絡，以便用戶查檢到有效的信息；二，提高釋義元語言的統一性，正如上面提到，例證的表達形式仍需進一步明確，明確釋義內容各部分的表達選擇，如釋文、粵方言普通話對譯等部分，從而避免元語言選擇混亂而誤導用戶使用的現象；三，提高釋義內容與配例的關聯性。

（三）方言詞典的呈現應該融合多種媒介

方言，不僅在形式上包括言語交際的體現，在內容上還包含了大量百科性的知識，而這些條目常常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例如生産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民間風俗、各種儀式名稱等等。這些領域的詞條，作爲整體共現的較强，而文字釋義的處理往往不如圖片、音頻等其他媒介來的直觀。目前，本文所涉及的詞典中僅《范本》作了數字化的處理，在多媒體的呈現上仍差强人意。因此，詞典的信息化與“融媒體化”也需要得到一定的重視。

參考文獻

白宛如　1998　《廣州方言詞典 [M]》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曹志耘　2023　〈漢語方言詞典的定位與編寫問題——以《浙江方言詞典》爲例〉《方言》2023,45（04）:385-394.

陳晟　2021　《詞典學框架下的現代漢語方言詞典編纂研究》，福建師範大學

陳永聰　侯興泉　2023　《粵方言拼音方案概說》，《南方語言學》

高然　2013　〈粵語詞典編纂的問題與思考〉，《粵語研究（第十四期）》

高然　2023　〈粵語詞典編纂的基本原則〉，《南方語言學》

胡明揚　1982　《詞典學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黃建華 1987 《詞典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黃奇芳，2000 〈粵語詞典出版概況〉，《方言》 2000（04）：350-358 頁
黃樹先，吳娟 2000 〈論漢語方言的語義類型學意義——兼談語義類型學視野下漢語方言大型詞典的編纂〉，《語文研究》， 2019（04）：42-47 頁
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詞典編纂組 2021 《現代粵語詞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劉扳盛 2008 《廣州話普通話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
麥耘， 譚步雲 2011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
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 2017 《廣州話方言詞典（增訂版）》， 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
詹伯慧，肖自輝 2016 《漢語方言辭書編纂的理論與實踐》，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張勵妍，倪列懷，潘禮美 2018 《香港粵語大詞典》，香港：天地圖書
章宜華，雍和明 2007 《當代詞典學》， 北京：商務印書館
趙紅梅 2011 《漢語方言詞彙語義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鄭定歐 1999 《香港粵語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鄭定歐 2023 〈對《現代粵語詞典》的四點意見〉，《南方語言學》
Hartmann, R. R. K. 2001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Lexicography[M]. London：Routledge.
Swadesh, M.1952 Lexico-statistic dating of prehistoric ethnic contacts[J]. Proceeding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6, 452-463.

A Comparative Study on Yue Dialect Dictionaries

LUO Yuran[1], WU Wenzhi[2]
1.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luoyuran0711@outlook.com

Abstract

Dialect dictionaries are a special type of general-purpose dictionaries. The Compllation of dialect dictionaries is one of the critical tasks in dialectology research. However, The compllation of dialect dictionar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xicograph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mon basic lexical items and conducts a sampling study of published Cantonese dialect dictionaries, attempting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ue dialect dictionaries aiming macrostructure and microstructure, highlighting their commonalitie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six dictionarie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balance and systematicity of Yue dialect dictionaries regarding word collection, 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require improvement, Additlonary,it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dialect dictionaries.

Keywords: Yue Dialect; Dialect Dictionary; Dictionary Compilation; Contrastive Study